

魏晋的围棋和范汪的《棋品》

高 华 平

—

棋，即围棋，中国古代称为博弈。博弈，从广义上讲是中国古代对各类棋类游戏活动的总称，包括博、弈（围棋）、弹棋、投壶、塞、樗蒲、藏钩、四维、象戏等。从狭义上讲，“博”和“弈”则有区别。“博”，仅指博戏或“六博”而言；“弈”，则专指“围棋”。扬雄《方言》（五）：“围棋谓之弈，自关之东，齐鲁之间，皆谓之弈。”许慎《说文解字》“博”写作“籀”，曰：“籀，局戏也，六箸十二棋也。……古者，乌冑作籀。”又释“弈”曰：“弈，围棋也。”“博弈”又写作“博奕”，《汉书·陈遵传》载：“宣帝微时与（陈遂，陈遵祖父）有故，相随博奕，数负进。”颜师古注：“博，六博；奕，围棋也。”可见，在许多地方，“博”和“弈”有明显区别。

“博”、“弈”的相互区别，还可从古代“六博”、“博塞”、“《博经》”之类名称的出现中得到印证。《管子·四称》曰：“流于博塞。”同书《四时》篇又曰：“一政曰禁博塞。”《庄子·骈拇》曰：“臧与谷二人相与牧羊，而俱亡其羊，问臧奚事，则挟筴读书；问谷奚事，则博塞以游。”《楚辞·招魂》中“博”写“籀”，云：“篋蔽象棋，有六籀些。分曹并进，遒相迫所。成枭而牟，呼五白

些。晋制犀比，费白日些。”20世纪70年代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还出土了战国行“博”用的大小棋局。《西京杂记》卷下云：“许博昌，安陆人也。善陆博（即六博），窦婴好之，常与居处。……博昌又作《大博经》一篇，今传于世。”《颜氏家训·杂艺》曰：“古为大博则大箸，小博则二莢，今无晓者。”赵曦明注引鲍宏《博经》曰：“博局之戏，各设六箸，行六棋，故云六博。用十二棋，六白六黑，所掷骰谓之琼。”虽然对博的详情难知，但由此处可见其与“弈”之间的区别所在。

弈，作为中国古代士大夫琴、棋、书、画等必备素养之一，其起源的历史相当早。文献上将之追溯到了尧舜时代。《世说新语·巧艺》刘孝标注引张华《博物志》曰：“尧作围棋，以教丹朱。”《政事》篇注引《中兴书》云：“樗蒲，老子入胡所作外国戏耳；围棋，尧舜以教愚子；博弈，纣所造。”《路史·后纪》曰：“帝尧陶唐氏初娶富宜氏，曰女皇，生朱鬻佷、娵克……帝患之，为制弈棋以闲其情。”以上的说法并不一定可靠，但至迟到春秋战国时围棋已很流行。《论语·阳货》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关尹子·一字》曰：“习射、习御、习琴、习弈，终无一事，可以息一得者。”《孟子·告子上》云：“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诲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说明围棋在当时已非常普遍，并涌现出了一些国际性的大师，招徒授业，名声远播。

与此同时，围棋自身的体制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主要是它由早期的纵横各17道289路，发展到了后来纵横各19道361路的棋局。这个发展变化的具体时间虽难考定，但从《艺文类聚》等类书所引班固以来的《弈势》、《弈旨》等文章中我们仍不难察知。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围棋活动的兴盛。

二

无论从围棋的普及程度，还是棋艺的水平来看，真正称得上中国围棋史上第一高峰的，当数魏晋时期。魏晋时期，随着玄学清谈时尚的风靡天下和玄学“得意忘言”思想方法的普遍采用，士人们以体道得玄为己任，而作为末技小道的“弈”——围棋，也被当成了“道”的载体和“玄”之所在，因而获得了其发展的强大动力，迅速地走向繁荣和兴盛。

魏晋时期围棋的兴盛，首先表现在当时士人爱好围棋的人数众多上。据史料记载，在魏晋前期，尚弈之风即已相当盛行。《三国志·蜀书·费祎传》云：“延熙七年（蜀汉后主刘禅年号，245年），魏军次于兴势，假祎节，率众往御之。光禄大夫来敏至祎许别，求共围棋。于时羽檄交驰，人马擐甲，严驾已讫，祎与敏留意对戏，色无厌倦。”蜀汉如此，在东吴更盛。东吴文武将吏蔡颖、吕范、陆逊等，均好此艺。《三国志·吴书·吴王五子（孙和）传》云：“蔡颖好弈，直事在署者颇学焉。”“群寮侍宴”，往往“言及博弈”。当时韦曜（《艺文类聚》卷七十四作“韦昭”）著《博弈论》曰：“今世之人，不务经术，好习博弈，废事弃业”，以至于“废寝与食，穷日尽明，继以蜡烛。”

相比之下，曹魏“挟天子以令诸侯”，国势更强，人才更盛，尚弈之风亦更烈。沈约《棋品序》云：“弈之时义大哉！……是以汉魏名贤，高品间出；晋宋盛士，逸思争流。”指的正是这一情形。据笔者依史料不完全统计，魏晋时期有案可稽的围棋之士略有曹操、曹丕、应瑒、邯郸淳、蔡洪、曹掄、范汪、曹彰、孔融二子、王粲、山子道、王九真、孔桂、郭凯、司马炎、王戎、王济、司马邈、张华、贾谧、顾雍、谢安、谢玄、桓玄、王坦之、羊忱、裴遐、阮简、祖纳、祖约、羊长和、马朗、袁羌、支遁、虞翻、谢弘微、卢循、罗腾、鸠摩罗什、庾仲初、颜延之等，共40余人。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注引《博物志》曰：“冯翊山子道、王九真、郭凯等善围棋，太祖皆与埒能。”《世说新语·巧艺》云：“羊长和博学工书，能骑射，善围棋。诸羊后多知书，而射、弈余艺莫逮。”可见，当时学习围棋已习以成俗。

魏晋时期围棋活动的兴盛，其次表现在当时善弈士人对围棋的耽爱程度上。魏晋士人对围棋的痴迷，我们不仅从韦曜《博弈论》中“忘寝与食，穷日尽明，继以蜡烛”。或“当以临局交争，雌雄未决……虽有太牢之饌，《韶》《夏》之乐，不暇存也”这类正面描述中见出；更可以从他们围棋时的近乎反常的行为中推知。如淝水之战时，东晋与前秦决战时期谢安围棋以示镇静，阮籍母丧与人围棋决赌，阮简临乱围棋不辍，等等。《晋书·阮籍传》载：“（阮籍）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世说新语·德行》刘孝标注引《晋阳秋》云：“（王）戎为豫州刺史，遭母忧……或观棋弈，而容貌毁悴，杖而后起。”《世说新语·雅量》载：“裴遐在周馥处，馥设主人。遐与人围棋。馥司马行酒。遐正戏，不时为饮。司马恚，因曳遐坠地。遐还坐，举止如常，颜色不变，复戏如故。”《水经注》卷二十二《潜水注》引《陈留志》曰：“阮简字茂弘，为开封令，县有劫贼。外白之甚数，阮方围棋长啸。吏云：‘劫急。’阮曰：‘局上劫亦甚急。’其耽乐如是。”魏晋时期的围棋之士的言行也许有些不近情理，但在这种种违常的行为背后，不也正反映着他们对围棋的极其痴迷么？

再次，魏晋时期围棋的兴盛，还表现在当时士人围棋技艺的普遍提高和围棋水平的精湛上。在魏晋时期，由于士人耽好对弈，不断钻研，棋艺水平已普遍提高，并涌现出了不少棋坛高手或“国手”。如王粲、江彪、王恬、王坦之、羊忱等。《世说新语·方正》载：“江仆射年少，王丞相呼与共棋。王手尝不如两道许，而欲敌道戏，试以观之。江不即下。王曰：‘君何以不行？’江曰：‘恐不得尔。’傍有客曰：‘此年少戏乃不恶。’王徐举首曰：‘此年

少，非唯围棋见胜。”江仆射即江彪，刘孝标注引徐广《晋纪》曰：江彪字思玄，陈留人。博学知名，兼善弈，为中兴之冠。”江彪年少时便已胜王丞相（导）“两道许”，且沉着老练，俨然是一位棋坛宿将，品格着实不凡。而另一位棋坛高手王恬亦是如此。《晋书·王导传》附《恬传》云：“（王恬）晚节更好士，多技艺，善弈棋，为中兴第一。”故范汪《棋品》将其与江彪一起列为“第一品。”

魏晋时期士人有如此精湛的围棋技艺，故历代均不乏带有神话之传奇性的记载。如《艺文类聚》卷十四引《俗说》曰：“殷仲堪在都，尝往看棋，诸从在瓦官寺前宅上。于时袁羌与人共在窗下围棋。仲堪在里，问袁《易》义，袁应对如流，围棋不辍。”《酉阳杂俎》载：“晋鸠摩罗什与人棋，拾敌死子，空处如龙凤形。”而王粲、王坦之则被人称为“弈中神人”和“棋圣。”^①

三

魏晋时期围棋的兴盛，另有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围棋实践的发展，促进了围棋理论水平的极大提高，使当时的围棋品藻活动活跃起来，并产生了许多品评棋艺的艺文作品，特别是产生了在中国艺术批评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专门性的棋艺批评著作——范汪的《棋品》。

魏晋时期涉及围棋理论探讨与批评方面的艺文作品，较有影响的有应场的《弈势》、邯郸淳的《艺经》、马朗的《围棋势》、蔡洪与曹掾的《围棋赋》等，但这些作品多局限于谈论围棋变化的繁复和器具的象征意义，而没有对围棋技艺进行全面的理论总结，更未能依中国美学史上“知人论世”的传统和当时人物品藻的时尚，对现实的围棋活动与棋手进行系统的评价，以至于如梁朝钟嵘在《诗品序》中所说，棋坛亦是“喧议竞起，准的无依”。

造成当时整个棋坛好棋者众而棋评滞后的主要原因，在于弈手围棋理论和实践兼善的困难。刘恢《围棋赋序》曰：“司空从事

中郎庾仲初，性好围棋，终不达棋旨，言文则触类而生，对局则冥然而穷。”“庾仲初现象”应该不是个别的。要打破这一困局，尚有待于既具围棋实践经验，又具较高理论水平的艺评家的出现。而范汪就是当时在棋坛出现的这样一位具有很高理论创造自觉性的批评家。《棋品》一书正是在这样的状况下产生的。

范汪（约308—373）^②，字玄平，颖阳人，他是《春秋谷梁传集解》的作者范宁之父。《晋书》卷七十五《范汪传》载：

范汪字玄平，雍州刺史晷（《范汪别传》作“略”）之孙也。父稚，蚤卒。汪少孤贫，六岁过江，依外家新野庾氏。荊州刺史王澄见而奇之，曰：“兴范族者，必是子也。”年十三，丧母，居丧尽礼，亲邻哀之。及长，好学。外氏家贫，无以资给，汪乃庐于园中，布衣疏食，然薪写书，写毕，诵读亦遍，遂博学多通，善谈名理。

范汪生在西晋，但一出生即遭世之多艰，遂流寓江左。主要活动时间在东晋。《世说新语·排调》“范玄平在简文坐”条刘注引《范汪别传》曰：“汪字玄平，颖阳人。左将军略之孙也。少有不常之志，通敏多识，博涉经籍，致誉于时。历吏部尚书、徐兖二州刺史。”与《晋书·范汪传》的记载大同小异。

史籍中关于范汪的记载并不缺乏，但却未见有关他善围棋或撰写《棋品》的记载。现在我们只能根据一些相关的材料做一些大概推测。根据《世说新语》的记载，范汪之女范盖嫁王坦之，而王坦之即“以围棋是坐隐”的“棋圣”“王中郎”。《世说新语·巧艺》刘注引《语林》曰：“王以围棋为手谈，故在哀制中，祥后客来，方幅会戏。”酈道元《水经注》卷二十二《渠水注》引《语林》则曰：“王中郎以围棋为坐隐，或亦谓之手谈，又谓之为棋圣。”这说明这位著《废庄论》、并以礼谏谢安好妓乐的王坦之，是位嗜弈且具有一流棋艺的人物。而根据史料记载，范汪与他的女婿王坦之性格颇为接近，他本人又著有《棋品》，所以又似可推断，范

汪也应是颇好围棋，且棋艺十分高超的“棋手”。

《棋品》一书，《晋书》范汪本传没有记录，其名始见于《世说新语·政事》和《方正》刘孝标注文。《隋书·经籍志》无《棋品》，仅有“《棋九品序录》一卷，范汪等注”。^③殆即指《棋品》一书。其所以不依《世说新语》刘注而称此书为《棋九品序录》，或与南齐谢赫品画之书称《古画品录》之命意相同^④；也可能是《隋志》作者因担心会与梁武帝的《围棋品》（或称《棋品》）相混，而改称范书的缘故，但刘孝标早在南朝梁代，距东晋年代为近，其注《世说》引用范书即称为《棋品》，至唐朝修《隋志》反改为“《棋九品序录》一卷，范汪等注”，似为无理改动，不足为据，应以刘注称《棋品》为是。

范汪的《棋品》一书，在当时和整个南朝时期当是颇为流行的，史志载范书之后有袁遵的《后九品序》、梁武帝的《围棋品》诸书，便是明证。自唐至两宋，此书仍存。《旧唐书》、《新唐书》均载有此书，且皆作“《棋品》五卷，范汪等注”。然自《宋史·艺文志》开始，此书已不见著录。殆此书在宋元间佚失。

范汪之《棋品》今既已佚失，自无法再论其详。《世说新语》刘注曾引《棋品》两条，均甚简略。但范书既名《棋品》，则其基本特点应与《书品》、《画品》、《诗品》这类以“品”字名书者相同，属于既序录历朝围棋名人，又按“九品官人法”诠衡“棋手”的批评之作。《世说新语·方正》刘注引范汪《棋品》曰：“彪与王恬等，棋第一品，导第五品。”同书《德行》刘注又引《棋品》曰：“（虞）睿字道真，仕至郡功曹。”从这两处残文来看，《棋品》正是既叙录“棋手”的生平籍贯，又明分品第，诠衡人物的。南朝梁武帝撰《围棋品》（又称《棋品》），沈约为之作《序》，称“今撰录名氏，随品详书”，体例上或是范书的沿袭。

当然，由于年代久远，史料缺乏，《棋品》一书如何具体地“撰录名氏，随品详书”当时的棋坛名流，今已不得而知。北宋张

拟著有《棋经》一书，其中有“品格”一节，该节分棋品为九等，似有“九品”论人之遗意存焉。今姑节录其文于兹，以备参考云。其文有曰：

夫围棋之品有九：一曰入神，二曰坐照，三曰具体，四曰通幽，五曰用智，六曰小巧，七曰斗力，八曰若愚，九曰守拙。九品之外，不可胜计；未能入格，今不复云。

范汪《棋品》一书内容虽已不详，但在中国文化史特别是中古文化史上的意义，却极其重。它将人物和道德批评的模式成功地应用于艺术批评，将人物品藻和艺术批评结合起来，开创了一种重在对艺术人物品评论衡、划分优劣的新的艺术批评形式。中古艺术史上的《古画品录》、《书品》、《诗品》（又名《诗评》）等艺术批评著作的产生，或是受《棋品》启发的产物。日人兴膳宏《六朝文学论稿》虽曾涉及于此，惜未详论。梁钟嵘《诗品序》云：

昔九品论人，七略裁士，校以宾实，诚多未值。至若诗之为技，较尔可知，以类推之，殆均博弈。（着重号为引者加）

注：

①《古今图书集成》卷七百九十九引冯元仲《弈旦评》。

②《晋书·范汪传》记范汪弱冠至京师，遇苏峻乱（事在东晋咸和三年，328年），65岁卒，故依此推范汪当生于公元308年，卒于373年。

③案：范汪著《棋品》之前，无有此类棋艺著作问世。武英殿本《隋书·经籍志》及丁国钧《补晋书·艺文志》或列有题名“陆云撰”的《棋品序》，以致使人误以为范汪前已有《棋品》。然考之他本和今中华书局点校本《隋书·经籍志》，“陆云”，乃“陆云公”之误，陆云公，梁武帝时人，善弈，《梁书》有载，故知所谓陆云撰《棋品序》，其晚出于诸家“棋品”无疑也。

④谢赫《古画品录》出现后，姚最《续画品》，即已目谢书为“画品”。

作者工作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